

寻路中国系列

#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

关于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记录

[英] 立德夫人 (Alicia Bewicke Little) 著

方悄悄 余 思 刘向林 译



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
<http://www.phei.com.cn>

寻路中国系列

#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

关于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记录

[英] 立德夫人 (Alicia Bewicke Little) 著

方悄悄 余 思 刘向林 译

*The*  
Land of the  
Blue Gown

电子工业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 
北京 • BEIJING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/ （英）立德（Little,A.B.）著；方悄悄，余思，刘向林译.  
—北京：电子工业出版社，2016.3  
（寻路中国系列）  
ISBN 978-7-121-28188-4

I. ①穿… II. ①立… ②方… ③余… ④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史料—清代②风俗习惯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K249.06②K8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032821 号

策划编辑：李 欣

责任编辑：李 影 文字编辑：李 欣 特约编辑：韩奇桅

印 刷：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：100036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6.375 字数：180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5.00 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，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，联系及邮购电话：（010）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[zlts@phei.com.cn](mailto:zlts@phei.com.cn)，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[dbqq@phei.com.cn](mailto:dbqq@phei.com.cn)。

服务热线：（010）88258888

## 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·首访北京：围城之前 // 1
- 第二章·从引航镇到大沽口 // 9
- 第三章·烟台八月 // 14
- 第四章·上海的城墙 // 20
- 第五章·上海 // 24
- 第六章·乡村中国 // 32
- 第七章·春日宁波 // 38
- 第八章·九月的芜湖 // 51
- 第九章·宜昌——龙王洞和龙丘之行 // 56
- 第十章·阎王爷的府邸：丰都 // 63
- 第十一章·传教士的穷日子 // 68
- 第十二章·在重庆农村的生活 // 79
- 第十三章·西南地区的排外暴动 // 126

第十四章 · 对进一步暴乱的警惕 // 136

第十五章 · 温塘 // 143

第十六章 · 鲜为人知的边境部落 // 149

第十七章 · 餐桌的装饰 // 159

第十八章 · 传教士都在做什么 // 162

第十九章 · “反缠足”运动 // 171

第二十章 · 反缠足运动 // 186

后记 // 200

## 首访北京：围城之前

即使已经离开了北京，我仍由衷地觉得，那是我到过的最不可思议之地。当我们回到天津，映入眼帘的是崭新的蒸汽列车和铁路，尽管它们看上去还像小孩的玩意儿，但是考虑到三天前，我们还是骑着马颠出北京城，那感觉就像穿过了好几个世纪。天津，汽笛声鸣；铁匠锻打着砧子上的铁坯；水兵们赶着毛驴和马驹通过堤坝，全然一副英国式的派头。领事馆外，停着一艘海军中队的舰船，顶上真真切切地飘着白色的皇家舰旗。而三天前，当一队双峰驼驮着行李，随我们离开北京时，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似乎都在提醒：那还是一个不知公共卫生为何物的时代。没有下水道，其他的卫生设施更是闻所未闻——这里唯一的公共卫生成就只有化粪池，在大部分城门外都有一个（只有通州的是在城里）。城外空气中这种挥之不去的臭气，让人怀疑，骑马进入北京，是否会像传说中描述得那样令人愉快。

不过，若你厌倦了伦敦，厌倦那些充斥伦敦的新玩意：美学、卫生

学、社会经济学……那么，去北京旅行一趟，无疑会令你身心涤荡。北京是苦口良药，就如奎宁。皇家楼阁的琉璃瓦在晴天里熠熠生辉，在汉白玉桥的周围，甚至在煤山上，你都能观赏到此番美景；牌楼上静静盘着威严的金龙，深蓝、鲜绿、朱红这样的颜色却搭配得非常和谐；空气明净，连泥墙也变得赏心悦目；还有女人，尽管她们已经穿了几百年长裤和那种开衩式的旗袍。混迹在人群中，我们发现这些人都如此顺从，仿佛从未有过反抗的想法，随时准备为乘着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着马的侍从让路。

我们乘船一路逆风而上，顺着白河缓缓行驶。与我们同船的，有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。不管他的家族曾经如何显贵，他看上去可都是一位孱弱不堪的继承人。他不停地吸着烟，双颊灰白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一言不发。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，才能将这样的形象与一位正在赴任、即将建功立业的官候联系起来。我们刚刚参观了北京的科举考场——可不仅仅是像多数人那样走马观花，而是真的走了进去。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就在那里进行，中国男子就是通过这样的考试追逐最高功名，而成功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石碑上，供万世瞻仰。

说起来，在中国，科举考场是最令人惊异的场所之一。即使那里仍旧是中国最优秀的男子追逐最高荣誉的地方，却给人一种被遗弃的、缺乏活力的感觉，那种感觉比你在意大利看到古罗马遗址时尤甚。这使我联想到另一种情形：即使是一座千年未曾举行仪式的异教庙宇，其所保留的宗教感，也比一座一年定期举办两场盛大法事的中国庙宇要强烈些（北京的庙宇在围城之前每年都要举办两场法事，现在是否仍这样我不知道）。阿波罗和朱庇特在欧洲至今受到的礼遇，仍然要高于释迦牟尼、大慈大悲观世音在中国的待遇。迄今为止，我在这个国家，

并未感受到一丝虔诚的宗教氛围。

有人说，中国人信仰的是佛教、儒教和道教。但在中国游历几个月之后，我就对这种观点不再那样信服。在中国，除了庙宇和神像，还有什么宗教的影子呢？而如果庙宇和神像就代表着信奉，那罗马到如今还是多种宗教的都城呢。我在伦敦时曾给外国人做导游，对当时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：在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，里面的祈祷还没结束，一位活泼的德国女游客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能用望远镜看一眼这美丽的建筑吗？”她并不是天主教徒，当时一起参观的游客里没有一个是，可是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威仪，却令他们肃然起敬。而在中国，比方说，在孔庙，有谁会为了使用一下望远镜而战战兢兢呢？记得那天我们还参观了长老院，却连朝里面看一眼都不准，因为长老们还没有做祈祷。警卫告诉我们，在祈祷完毕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往里看，绝无例外。“每天都是如此——每天？”一位瑞典教授郑重地问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叹道：“那么，不管这一切是否发自内心，我都得说，你们英国是一个了不得的国家。”

除了宗教感的淡漠，中国人对规则的漠视也令我感到惊异。不过，这种漠视可能的确符合人性，因为它很快就传染了在中国的欧洲人。尽管我这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所谓的“外国”度过，但只有来到中国，我才第一次听到一位女士说，她礼拜天的时候出去野餐了。后来我才发现这种事情如此普遍，以至于礼拜天出去野餐仿佛才是这儿的规矩。“礼拜天，就是得出去放松一下嘛。”女士们如此坚持。如果她们是待在雾气弥漫的伦敦或者利物浦，这么说可能还多少能有点说服力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文明世界还有哪一处的教堂，比在中国的还要人迹罕至。所以我时常想起一位海关官员对我说的话：“我想，被英国传教士教化成

基督徒的中国人，也许还没有被中国人教化成异教徒的英国人多。”

看着如大车店般杂乱不堪的北京城，我不禁陷入思量，这座城市到底是凭着什么难以言说的魅力，最终征服了原本作为征服者的满洲人？如果只凭我的第一印象，这座城市精神上的粗鄙和淡漠，简直是个可怕的榜样。或许，这是因为“中国人什么也不在乎，只在乎钱”？这能解释这一切吗？可是我发现，如今欧洲人也只是想从中国人手里挣钱而已啊！就连那些宣扬“金钱是万恶之源”的传教士，都已经染上了这一痼疾。

北京有许多可爱的苗圃。在京时间，我们经过那里，发现苗圃里开满了鲜花，每个从里面出来的人，都捧着满手的晚香玉。在前门，也就是城市的正门，摆满了一排排待售的海桐，枝上花朵累累。中国人是如此喜爱花朵的香气，几近超过了花朵本身。他们尤其钟爱那种浓郁而甜美的花香。中国人是幸运的，他们的鼻子构造仿佛只对香气有反应，对于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臭气，他们似乎连鼻翼都懒得皱皱。

站在城墙上，北京更像一个公园，而不是一个人口稠密的都市，我想这多半是因为城里多有良木的缘故。皇宫的前面栽种着一排排秀丽的树木，每个平民的院子里都至少有一棵树——要是大一点的院子，则被绿荫覆盖。说真的，如果北京城是按照她本来应当的样子，或者她曾经的模样存在，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为宏大的都市了。即使是现在来看，北京城原本的规划也是完美的，尤其令人赞赏的一处设计是，当你站在鼓楼与钟楼上对望，其透视性、均衡感如此绝妙地加强了这两处的间距效果，每一处细节都呈现出整个建筑的庄严。一道阳台，就本身来看平平无奇，却在钟鼓楼的映衬下显得美不胜收。在英国人尤为欠缺的方面，蒙古人可谓做得再出色不过了。我想，我们的立法

院和新帝国学院的选址，永远不可能在忽必烈大帝那儿获得通过。就设计而言，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：她的整个骨架庞大而壮丽。更富于意味的是，她本身就是一处历史的遗迹，我们过去只能在书中读到的许多东西，在这里却是活生生的。大人物们住在穷奢极欲的深宫（尽管那种生活根本谈不上舒适），不得不外出之时，总有侍卫和仆从前呼后拥，将他们与百姓牢牢隔开，以防平民的呼吸玷污了老爷们的贵气。我能想象，一些心善的贵妇人，或者是她们中间比较胆大的年轻人，会微微掀开轿帘，满怀怜悯地打量着这帮百姓——他们身体发育不良，皮肤生疮，衣不蔽体，却又惊人得保守和顽固，从不去想做任何事情改变自己悲惨的境遇。北京的大街上还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流氓，也许正是那些大人物们的食客，他们好像随时都能跟人闹起一场纠纷。归根到底，那些饱食终日的大人物们的怜悯是很容易消失的，一俟他们回到自己植满树木——遮天蔽日的树木的美丽庭院，怜悯旋即化作厌恶和淡漠。当一辆马车从街上驶过，车上坐着一位美丽、矜持、笑意盈盈的满族女子，她凝视着道路，脸上有种愉悦又迷惘的气息……这一幕，就好像将一页中世纪的历史，活色生香地搬到了我们眼前。

我不知道在忽必烈大帝或者他的继任者手中，北京是否是个更洁净——或者表达得更恰当一点，是个维护得更好的城市。这一切在今天已无从得知。而今当我们想起北京，只会感到一阵无以名状的惆怅：为何这个精心设计、规模宏大的古都，却沦为今日这般不堪的模样？当我回通州时，这种惆怅简直上升成了愤怒：马路上凌乱不堪，垃圾遍地，装得太重的运货马车在横七竖八的车辙里挣扎着，就像小船在海浪里颠簸。拉车的马驹和骡子被折磨得疲惫不堪，精壮的汉子将上衣褪至腰间露出古铜色的身躯，像头牲口似的推着车子。他们年复一年地重

复着这样沉重的劳作，只是为了将车子从车辙里推出来——而那些车辙本来根本不应该存在。人的劳力是宝贵的，本该被更为珍重地使用，而不应被如此毫无意义地浪费。通州的路真该修一修了！想象一下，如果路修好了，这些男人，这些牲口，他们辛苦的劳作，可以比今日创造出百倍的价值，这该有多好？可我看到的依然是人们疤痕累累的身躯、早熟的面庞、还有粗俗无礼的态度。我还曾在圣文森特修道院看到姐妹们护理病弱的中国孩子，他们面色苍白，头上生着脓疮，眼睛也有病。有人还说中国的穷人根本不觉得自己有多苦，每天都笑嘻嘻的很快活。他们过去也是这样评价黑奴的。黑奴倒也很爱笑，可我们中有哪一位愿意与之交换自己的地位？同理，又有谁愿意与今天的中国民众异地处之，来承受这些完全人为造成的苦难？一天又一天，这些可怜人受的苦难愈加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。因为我深知这些苦楚既不是由于气候，也不是由于土地，更非因他们的性格造成。只要朝廷允准，一定很快便会有人不遗余力整治这条道路，清除障碍，将一切整治得井井有条。这条路修好后，一定会大大改观欧洲人进出北京的印象。

我曾经到过意大利的阿尔马非，在那儿，我感觉自己完全走入了中世纪。街道上多是又高又窄的台阶，台阶下一片黑暗，常有强人埋伏于此，打劫过往行人。在阿尔马非，一位身份尊贵的女士根本不能独自出行——或者，她压根儿就不应该出行，因为她要冒很大的风险，要么弄脏她的白裙子，要么弄脏她的灵魂。我要说的是，北京很像是一个更大型的阿尔马非，而且处在一个更蒙昧的时代。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是紫禁城的神秘。从未有一个欧洲人踏足过紫禁城<sup>[1]</sup>，年幼的皇帝也

[1] 此说法不准确，明清就有郎世宁、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庄士敦等欧洲人在紫禁城为官、从事文化交流。——编注

从未踏出城外一步。所有人都在传言，当今在紫禁城里执掌大权的太后，是一位性格刚强、意志坚定的女人，若她决定做一件事，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没错，她热爱权力，但她只关心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吗？她是否会利用这权力去做些好事？她是否像我们高贵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，对死去的丈夫抱有深切怀念，并且努力当好一个母亲？她毕竟是个女人啊！当她坐在沉重的帘幕背后，看着年幼的皇帝正襟危坐，大臣们跪在朝堂山呼万岁，当她沉默地聆听着这一切，是否有一瞬间，对这延续千年的陈规感到窒息？又或者她只像普通的女人一样，甘于尊奉传统，而害怕任何的变革？我倒觉得她并不是如此抗拒新鲜事物。前段时间，因为从教堂的塔楼上可以看见皇家庭园，塔利亚布主教和他的神父们必须搬出教堂，而我们听闻，太后决定将这座教堂留给自己使用。她甚至特意下令，要为她原封不动地保留阿玛德·大卫那套珍奇的中国鸟标本，还有教堂里的管风琴。一时间传闻甚嚣尘上，都说太后决定将教堂辟为会见厅，在那儿接待外国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如果像我后来听说的那样，太后不仅将接见外国人，还将允许修筑一条铁路通往北京的城门，那么我想，北京很快就能改变目前这种杂乱而蒙昧的面貌，成为能与世界上其他大都市一决高下的城市。

不过，将北京变得更像其他城市——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好处呢？我曾经听过白金汉宫的管家如此评价一位波斯国王：“国王如今星期天也躺在床上，和真正的绅士一个样！”那评价令我十分难过。他还告诉我，许多波斯国家的后宫妃嫔们，常常跑出去看一场芭蕾，来炫耀自己已经欧洲化。难道北京也会变成这样？

人们啊，不带偏见地看待事物，有多么困难！当我满怀愤怒地看着通州那条糟糕透顶的马路，看着人和牲畜近乎绝望地在石路上推车，不

会想到这条路建于明朝，连接了通州和北京，是当年的一项伟业。我只能看到，上帝啊，这路比没有还糟！当我想到这种情形会在酷热难当、灰尘漫天的夏日或冰天雪地、雾蒙蒙的冬季一次次上演，心情就愈加激动——可是，如果中国人知道了我们是怎样把下水道的污水排进河流和海洋，会不会也一样震惊？人口和环境都在恶化，伦敦大雾给行人交通造成的不便，可能不下于通州的道路，我们却一样熟视无睹，认为这一切迟早都会解决。

也许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如此，对他人的缺陷分外敏感，对自己的缺陷却熟视无睹。

## 从引航镇到大沽口

引航镇距离大沽口并不远。以前，这里只是引航员的驻地，所以，那个时候，当人们乘船从大沽口经过驶往天津时，几乎很少上岸稍作停留。更何况关于此地有着很多耸人听闻的说法，比如航道窄狭曲折，极易搁浅；引航员的工作无疑是种自杀行为等。然而，从目前看来，这些话都是传言而已。如果有机会，建议前去看一看。引航员们已经在此地建造起了一个小镇，他们仿效附近村民，建起一排排土坯房，房子虽多为泥墙泥顶，但用大白粉刷之后，白色的房子配着刷得乌黑油亮的门框，显得格外清新明亮而富于韵律。镇上的空气也相当清新。显而易见，引航员们生活得还挺不错。

在英国，传统的村庄通常以绿地为中心，引航镇的格局也是如此。镇中心是一个草地网球场，在中国的北方，球场基本上都是非常泥泞的，这里的网球场也不例外。球场周围有一些供观看比赛用的长椅。我们抵达后，很快就获知，在当地十几位外国女士的潜移默化下，小镇的生活

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现在，不仅有狂欢节，虽然规模无法与北京、上海相比，而且还有舞会及郊游等，同样都可以让人们尽兴而归。中国的北方，想不出有什么活动不是以舞会作为结束的。

在来引航镇之前，我曾经到过大连北岸，那里乏善可陈。即使是最不挑剔的游客也难以搜寻到赞美之词。如果引用斯奈格斯经常说的话：“假如不用过分夸奖的话”来形容，或许可以说那里的乡村泥地湿滑平坦，如同海水退去的沙滩。然而位于南岸的引航镇，像是镶嵌在广袤的土黄色平原上的一块绿洲，高大的树木与低矮的灌木丛随处可见。镇上的居民们还自己修建了一条通往大连的公路。为了防止洪水冲垮路基，他们一次次对其加高、巩固。镇上的街道虽然不宽，却由平坦的砖石铺就，看起来非常整洁。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，引航员们竟然创造出了这么宜人的生活环境，令人难以想象。

引航员是个特殊的职业，不过，社会还没有给予足够的认同，引航镇没有教堂，也没有牧师，甚至也没有礼拜堂。如果有人想做礼拜，只有等待传教士恰好从这里经过的时候。冬季，水面冰封，北上的船只能在烟台靠岸装卸。这个时候的引航镇如同与外界隔绝一般，漫长的三个月里，没事可做的引航员们只能依靠骑马、滑雪或者跳舞来打发时间。这样的生活看起来也不错，但是也有人别有用意地说，引航员之间经常发生争吵。不过，只要想象一下也就不难理解了，即使是在可以天天在网球场上消磨时光的季节里，如果长期与外界隔绝，那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。

总而言之，请原谅我不得不说，在我看来，引航镇居民的精神生活其实还非常贫乏，社会生活与之相比，也没有更加丰富。这里没有任何正式的行政机构，更不要说镇长，或是镇政府了。不过，值得一提

的是镇上一位很有经济头脑的居民开了一家大沽旅馆，旅馆内有两张台球桌，院里还种着好几株看起来兴高采烈的向日葵。全镇的居民都为拥有这样一家旅馆而备感骄傲。

与之前相比，由于现在镇上与外界联系紧密得多，所以不时会有希望能够享受大沽口新鲜空气的人从天津城里前来。就在前几天，还有一对新婚夫妇专门来大沽旅馆度蜜月，天津的《中国时报》为此还报道了这一时尚之举。可是，大沽旅馆除了可以提供睡觉之处外，其实并没有其他特别之处。当然，这里的空气确实非常新鲜，旅馆也可以令人感受到家的温馨。

从引航镇出发，沿着居民们修建的那条公路一直走，穿过泥泞的沼泽地，就会到达中国人住的大沽口。然后左转，就可以看见大沽口炮台。在那场战争中，英国人从背面攻陷大沽口，然后前往北京，将圆明园焚之一炬，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。中国人认为在那场战争中，英国人胜之不武，因为英国人既不是正面进攻，也没有鸣锣以示开战。现在，如果要进入炮台内部，必须出示证件，其实只要在门口望一望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。炮台里，年轻的中国士兵们衣帽歪斜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而他们那些身着有些褪色的蓝紫长衫的长官们，同样也是萎靡不振。在他们的身上，你根本看不到一丝军人的英武之气。

在炮台附近有一座英国军人墓园，是为了纪念1860年~1862年在华北地区倒下的英国军人们。这里可能是到大沽口的英国人去得最多的地方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墓园大门敞开，围墙破败不堪，只余残垣断壁。园里的大部分墓碑都仆倒在地，地上四处散落着被拆掉的墓砖。通过仔细辨认一块石碑上隐约可见的字迹，我们知道这块碑是为了纪念阵亡的皇家炮兵和工程兵们，由死者的同伴所立。

相比这些损毁严重的花岗岩墓碑，反倒是有些木质墓碑很好地保留下来，有一块墓碑的主人名字为马奇·努简特的舰长，卒于1876年；还有一块属于二等兵墨菲；最大的一块墓碑上面则布满某一支队伍1860年~1862年间阵亡的所有将士名单，由于最前面的几个字母模糊不清，所以我们无从知晓这到底属于哪个舰队。其中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块上面刻有皇家海军舰艇“维泽尔号”上六名水手和司炉工名字の木碑。木碑做工精良，我猜想必是随船的木匠为纪念曾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朋友们精心制成。它静静地伫立在墓前，虽然历经多年的风吹雨打，却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依旧如新。

这座墓园属于英国所有，我听说引航镇的居民一度想保护它，他们四处寻求援助，不仅向英国领事求助，而且还曾经计划写信给大臣卫斯理。他们还打算重新修整墓园，在女王大赦的狂欢节上作为礼物献给她，因为这里长眠的陆海军将士都是为保卫英国献身的。但是，最终他们出于世俗的考虑，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碰巧住在这附近的英国人而已，与长眠在此的阵亡将士毫无关系。作为一名引航员，完全没有必要为英国政府守护墓园。

如果修整这座墓园，我估计要花费不少钱。可是这些死去的人们不正是因为对华作战才来到中国吗？如今他们的墓地已经逐渐毁于当年中国人的后代手中。如果政府认为修整墓园费用过高，我倒是建议不如将现存的墓碑迁移到位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教堂里，墓园里种些花草以示纪念就好，这总比任由这些墓碑损毁殆尽强很多。要知道，真正毁掉这些墓地的凶手并不是时间流逝、大自然的风吹雨打，而是那些人的双手，他们拆毁墓园围墙，推倒墓碑，偷走墓碑。

可是就是这些人，竟然将一具同胞的尸体停放在墓园里。尸体上